

## 陈平关于北大教授聘任制改革的评论

2003年6月29日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“教育国有化和教授终身制--北大教授聘任制改革”座谈会。赵耀辉教授主持座谈会，周其仁教授就“教育国有化与教授聘用制”做主题发言，胡大源教授介绍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人事管理”若干做法，陈平教授作评论发言，最后闵维方书记介绍“北京大学人事改革”指导思想和有关情况。

.....

### 陈平教授评论

我先评论北大BBS上的问题，再评论周其仁和胡大源的讨论。这次北大改革的反映之大出乎我的意外，我觉得北大这样的改革从国际标准上来讲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想不到在北大大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。看了BBS上的讨论之后，我觉得有三个重要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：北大的改革是否是媒体评论的“休克疗法”

换言之，北大改革的步伐是否太快了，或者是淘汰率太高了？先说世界一流大学取得终身教授职的淘汰率，美国前十名大学为80-90%，前50名大学是50%以上。即使如此，近年来美国改革终身制的呼声很高。因为物理等基础学科，七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新的职位。冷战时代招聘的教授还未退休。过去二十年新领域的突破大都是没有终生职的研究生和研究员做的。我在的德克萨斯大学校方，刚刚提出要对已经获得终身职的教授每隔几年要做评审，商学院一位有名的研究金融兼并的名讲座教授就自己先走了，因为他过去虽有成就，但近年没多少创新。相对国际一流大学而言，北大的本科教育是国际先进的，但研究院水准就参差不齐。目前北大提出的改革，具有“摸石头过河”和渐进改革的中国特色，和休克疗法相距甚远。

我很惊奇北大校园的反应，和国际潮流反差甚大。为什么呢？我对北大有些观察：是北大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北大的竞争意识。我不是北大毕业的，但我来北大已经六个半年了。我非常喜欢北大学生的思想活跃，非常喜欢北大老师的多样领域，但是非常不喜欢北大崇尚高分，追逐名家，自命老大，不重创新的校园文化，非常不喜欢北大缺乏国际竞争和学派交锋的研究体制。在北大的学生可能感觉不强烈，但我从科学院出国后看得很清楚：北大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垄断，垄断导致竞争意识薄弱，积压许多人才。现在很多后起大学正在挖北大真正能干的教师，相信闵校长有这个危机感。但很多北大的人可能没感到国际竞争的压力，沾沾自喜说每年北大有多少高考状元。其实国外研究型的大学早就放弃高分取人，而竞争发现有创新思想的学生。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年招收研究生，用分数线以上多一倍的名额进行面试，还每年举办全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，不拘一格发现人才。传统科举式的考试不足以发现创造性人才。一旦中国教育部允许国外大学进入中国或放宽民办大学的限制，到时候北大受到的冲击不知要比现在大多少倍。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改革，应当奋起直追。北大清华目前的龙头地位是教育部门的垄断政策扶植出来的，不是国内国际竞争中打出来的。如果不能经受开放竞争的挑战，愿意改革的人就会开路走人。像周其仁所说，吸引一个好老师的是北大的学生而不是它的名声。北大刚开始的人事改革，符合国际竞争和中国改革的潮流，而不是相反。

第二，青年教师面临的是压力还是机会？

BBS上让我感动的一个呼吁是说要对青年教师多些人文关怀，说他们最辛苦，所承受的压力风险也最大，为什么先拿他们开刀？我是过来人，非常同情和了解青年教师的辛苦和压力。但我的反应相反：即使在北大竞争暂时出局，也未必是件坏事。我在科学院工作时，因为不是北大出身的物理嫡系，被排除出理论和实验物理的主流领域，调去干科技管理和政策研究的“杂活”，即使作出一些非物理的成就受到社会好评，却被同学和同事嘲笑为“杂家”。这

些曲折反而成为我一生的转折点，刺激我进入复杂科学和经济物理的新领域。七十年代科学院里的北大毕业生流传一句话：“（在）北大一条虫，出去一条龙”。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，年轻人那样多机会，为什么要害怕竞争？以我的经历，一时的曲折，在北大拿不到教授头衔有什么了不起？这对他们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须知热门只是昨天的机会，历史属于探索的前驱。年轻人如果认为你受了委屈，领导没有伯乐眼光，还不如自己出去闯荡一番，发现新的市场。将来再回北大交流，感觉会更好。

第三，北大创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？

BBS上有人说北大要创世界一流学校是像大跃进当年的目标--“十五年赶上英国”那样不切实际。我不以为然。中国目前不缺人才，只差体制改革。以我所知道的两个领域--非线性物理和非均衡经济学为例，至少有两个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学者都到了北大，一个是物理系的欧阳祺教授和他做的实验，另一个在力学系搞流体力学理论的余振苏教授，他们都有国际影响。我也相信自己的竞争力。但是来北大之后，在北大的现有体制下能否继续做出世界一流的贡献？在现行体制下很难。为什么？中国是官本位制的，不是学术本位。在美国全心身都在想问题，在北大绝大部分时间做杂务。北大是行政主导的大学，各个部门整天要你填报表开会，稍微有贡献的学者又忙于上电视台上报纸，有多少精力关注国际竞争？北大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，一定要创造一流学生能在一流学者带动下，做前沿研究而非考试高分的学术环境。

第四、对周其仁观点的评论

他的观点我全部都支持，但我要做两点修正。第一点修正，他喜欢哈耶克，说改革是“知识上的冒险”。我更喜欢我的老师普利高津的说法。我曾问普利高津，什么是科学创造的动力？他说是远见(vision)，是梦想(dream)——我认为这和哈耶克是一致的。科学创造如果靠民主投票就不是科学了，因为前沿科学家开始总是少数。爱因斯坦是不能由科学家投票来证明他的相对论是对的，诺贝尔奖的多数评委在二十年内都不能接受。开创新的事业是需要冒险和梦想的，没有这个勇气就不要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。所以评审终身教授，最好不是由全体正教授投票，而是由校长物色有改革思想的院长，组织由前沿研究的学者组成的评审小组来选优，当然评审委员的学术资格可以由教授会投信任票来授权。教学和研究型的教授要分流，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。否则，北大难以完成从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结构转型。

第二个修正，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看，改革旧的体制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生长新的体制，让新体制有个示范作用，冲击旧体制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。

在北大这种情况下改革人事制度，我认为淘汰25%都太低了，出去的人反而有心理压力。要是淘汰率高些，出局的人其它学校会抢着要。教育体制的判断短期难见分晓，我赞成周其仁的各个院竞争选优的观点，十年八年后再看，哪个不好责任是院长的，把他给撤了。但我认为院长也难当。重要的是要识别几个生长点，哪个院哪个系里头真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带头人，给他创造条件，不是汽车洋房，而是不受干扰的科研条件，让他有破格录取学生的权力，带上几个合作者或三五个学生，就能做世界一流的工作，被大家接受以后，让他到系里推广或改革。这叫双轨竞争，和国企改革一样，国立大学的改革，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竞争，像乡镇企业和跨国公司对于国有企业的竞争，是难以改革为国际一流大学的。

[原载]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简报，2003年第59期（总第401期）

“北大教授聘任制改革”座谈会纪要，2003-7-14。